

桃李不言 —— 懷念張光直先生

陳光祖
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猶記得十年前秋季，我剛到哈佛，張光直先生請我到神學院後面的一家中國餐館吃飯。餐後，與張先生一同走進校園，我們一面聊天，張先生一面為我介紹校園裡的建築物，使我首度對哈佛有了初步的瞭解。倏忽十年，張先生已然作古，思之不禁愴然。

長春藤盟校大多要求學生托福成績在六百分以上，我的語文能力一向不好，而哈佛竟然同意我的申請，除了我

無須學校的獎學金支持之外，張先生在其間必然曾經出力協調。我在史語所的主要工作內容與興趣是科技考古學，當時以為哈佛人類學系在科技考古學方面並不活躍，所以主要考慮了幾個以此為重點的大學人類學系，如U. of Penn.、Arizona State U.、U. of Arizona、U. of Michigan、U. of Wisconsin-Madison等，但由於哈佛的學術地位，以及張光直先生在哈佛任教，所以也向哈佛提出申請。後來約略同時收到包括哈佛在內的幾間學校的同意入學通知書，就在我猶豫不決之際，適逢張先生返台參加院士會議，張先生告訴我哈佛人類學系也有從事科技考古學的教授，而且學術成績很好。最後，我選擇到哈佛跟 Nikolaas van der Merwe (Landon T. Clay Professor of Archaeometry)作博士生，現在回想，還是很感謝張先生臨門一腳，讓我作了正確的選擇。

在新生活開始的一段適應期，讓我吃了一些苦頭，學期開始後的頭一次期中考，由於是首次用英文作答，答題的速度太慢，考的不理想。張先生知道此事，十分擔心，找我去問話，表達他的關心，但或許他知道史語所的研究人員有辦法自己度過難



1994年陳光祖考完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後，與口試委員合影。
右二為 Prof. Van Merwe，左一為慕容捷博士。

關，張先生並沒有給我什麼強勢指導。而後，我漸漸習慣美國大學的教學與考試方式，生活上也逐漸適應，也開始發展我未來工作的方向，張先生始終尊重我的選擇，也都毫不保留地在我需要時，給我適時的支持與意見。我的主要指導教授 Prof. van der Merwe也沒有給我學習上的任何限制，讓我在哈佛度過個人學識發展上的一段黃金歲月。

在大約是一九九三年左右，北大考古系陳鐵梅教授應張先生之邀來哈佛訪問，夜宿學校經營的旅館Harvard Inn，張先生要請陳教授去半哩外的中國餐館「五月花」吃晚飯，張先生知道我是作科技考古學的，要我作陪。我知道張先生的用意，是要拓展我的視野並提供我與大陸學者交流的機會，自是銘感於心。當天晚上，我來到旅館，張先生與張師母過不久也到了，但張先生在靠邊停車時，輪胎被人行道護坡劃破，而美國汽車協會AAA的拖吊救援車因聯絡地點有誤，讓我們一行人在旅館等了近兩個小時，張先生覺得很不可思議，並有些不悅，但始終未發脾氣，一行四人在旅館大廳一面閒聊，一面等待救援車，雖然度過了尷尬的一晚，但我與陳教授卻因此而熟稔。

我個性疏懶，一向畏見大人，但張先生雖然學術地位尊崇，卻不崖岸自高，對待學生如煦煦春風。不解的是，一些外國學生都蠻怕張先生。我的同學加拿大人余墨莉(Erika Evasdottir)曾對我說，張先生與中美洲考古學教父Gordon Willey都是great

archaeologists，是令人害怕的。但我自覺與張先生相處沒什麼壓力，我在Peabody Museum (人類學系系館)與同學Suszanne Young共用一間辦公室，隔幾個房間就是張先生辦公室。張先生辦公室的面積是系上最大的，但是偌大的辦公室仍被書填滿了，其中中國考古學方面的文獻收藏，並不亞於哈佛燕京圖書館。

當時，只要有空，常去張先生辦公室晃晃，或與張先生聊聊天，或看看他

架上的書。當時已感覺到，張先生真忙，訪客太多，時常佔據他不少的時間，但他通常十分樂意與晚輩以及同儕談話。張先生辦公室的大門經常是開著，僅偶爾，他有要事需處理，才會將辦公室門關上，而這時，經常還有學生待在他的辦公室裡看書。



1993年李匡悌夫婦（右二人）赴劍橋訪問張光直先生，攝於張先生寓所。陳光祖立於張先生右側，左二人為梁思源夫婦

張先生在國內外的中國考古學界佔極重要地位，這是人盡皆知的，但張先生在美國考古學界，也有著極重要的影響。在一九六〇年代，他與新考古學派的開山宗師L. Binford的論戰，以及張先生提出的一些原則性的看法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討論，在考古學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。人類學系考古部門（archaeology wing）的秘書Lauren Bunker曾在一次部門會議之後轉述，當時系上重量級的教授如C. C. Lamberg-Karlovsky、Ofer Bar-Yosef、van der Merwe等教授，都是國際知名考古學各領域的頂尖學者，當時他們對一個議案爭執不休，而張先生發言，一言而定。我想除了張先生曾任哈佛人類學系系主任，又專任系上教授多年，在系上有一言九鼎的份量之外，他處事圓融，待人誠懇，思慮周詳，面面俱到，可能更是讓同儕信服的原因。

張先生作學問十分認真而紮實，我曾翻查過張先生所做各種銅器銘文的拓片與釋文的資料卡，足足有十來個抽屜。而張先生於一九六〇年代代表Yale大學與臺灣大學合作計畫，在大坌坑與鳳鼻頭兩遺址發掘，從留下來的部分原始資料（現存中研院史語所臺灣考古研究室），可以看出他組織一個計畫聯合多學科為考古學服務的努力。而發掘資料中，較大件陶片的資料照片也有兩三盒之多，成為張先生臺灣考古的名著*Fengpitou, Tapenkeng,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* (1969)的基礎。

一九九四年，張先生的巴金森病症狀已經頗為明顯了，雖然有藥物控制，但仍不時會摔倒，學生們勸他用柺杖，他一直不肯，最終還是敵不過病魔的折騰，拾起了柺杖，學生們就看著病魔一步一步地奪走他的行為能力。而此時，他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劇，到他辦公室，看著他用顫抖的手坐在電腦前給各地學者寫信，心裡十分不忍，我們幾個常在張先生辦公室閒晃的學生如李永迪、曹音和我，還曾商量是否需要排時間來協助張先生作些文書方面的工作。過不久，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希望張先生回臺灣任副院長一職，在張先生思考期間，曾與學生輩聊天，當時，學生都擔心他的身體是否能負荷的了。雖然學生們所提供的意見多是負面的，但他有著為臺灣學術界拼命的認知，心中事實上已有了定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，張先生在三軍總醫院接受胚胎腦幹細胞移植手術，第一階段手術後的一段時間，史語所考古組同仁還曾安排按表輪流至三總照顧張先生。第二階段手術時，我與妻女至三總探望張先生，等不多久，張先生從恢復室回到病房，小女兒拿一顆糖說請張爺爺吃，張先生接過糖果，隨即打開包裝紙，將糖果塞進嘴裡，我看在眼裡，心裡十分感動。

去年三月下旬，我回到哈佛，由於忙著完成論文，加上聽說張先生狀況不穩定，

需要療養，所以直到四月中，才去探望。躺在病床上的張先生，瘦骨嶙峋，在此之前，張先生喉部肌肉已無法正常吞嚥，此時喉間更插著管子，我完全無法聽懂他的話。張先生雖然精神十分不好，但仍然努力地想把話講清楚，儘管我們都很努力，但我還是無法瞭解他想說什麼，連在師母準備的小白板上也無法留下可辨的字體。雖然張先生當時完全沒有行為能力，也喪失與人溝通的能力，但可以看的出來，他的頭腦仍很清楚，張師母說先前張先生還一直叨念著病好了還要去中國發掘。雖然我早已習慣張先生的病症，但仍無由地感到無限的悲哀，一個睿智的心靈，被禁錮在逐漸腐朽的軀體，對志在千里的人而言，是何等深沈的痛，面對著此一持續惡化無法挽回的惡症，當時只有一個至今仍無法說出口的感覺，張先生何時才能安息！

在海峽兩岸、在國際學術界，在考古學、亞洲研究、臺灣史研究各領域都有重要貢獻與地位的張光直先生，是一個在矮小身軀中，包裹著巨大心靈的人物，他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強者。儘管近幾年來，巴金森症逐漸侵蝕他的身體，一步步地奪去他的行為能力，而弱化他的肉體，卻始終未能奪去他強大的意志力。張先生雄心不減的，想抓住生命最後的機會，繼續甚而加速燃燒他可貴的精力，期望散放出燦爛的餘暉。與張先生相處機會較多的學生都知道，他晚年的兩件重大工作，尋找商文明來源計畫、以及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工作，而尤其是後者，非常快速地腐蝕了張先生的健康。我們從其仍然睿智的眼神，與猶然明晰的思考，感覺到他無法實現自己的計畫與掌握自己意志的痛苦。我不知道未能在豫東找到大邑商，對張先生一生學術生涯的影響為何？也不知道就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一職時，張先生是否有給自己定下什麼欲達成的目標？但至少在中研院考古學設所一案的後期作業，張先生因身體的因素，無法為其學術專業在臺灣的發展一戰，心中不免有些許遺憾吧！